

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饶怀民 主编

湖南首任都督 焦达峰传

杨 乔 著



岳麓書社

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饶怀民 主编

湖南首任都督 焦达峰传

杨 乔 著



岳麓書社

· 长 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首任都督焦达峰传/杨乔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8.4
(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ISBN 978-7-5538-0878-9

I. ①湖... II. ①杨... III. ①焦达峰(1887—1911)—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7674 号

HUNAN SHOUREN DUDU JIAODAFENG ZHUAN

湖南首任都督焦达峰传

作 者:杨 乔

责任编辑:管巧灵 王文西 邱建明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胡 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7.375

字数:205 千字

ISBN 978-7-5538-0878-9

定价:36.00 元

承印: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焦达峰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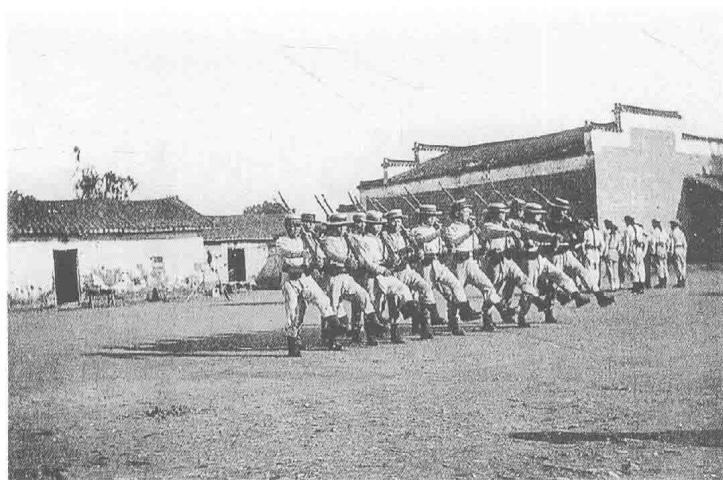
四正社旧址



共进会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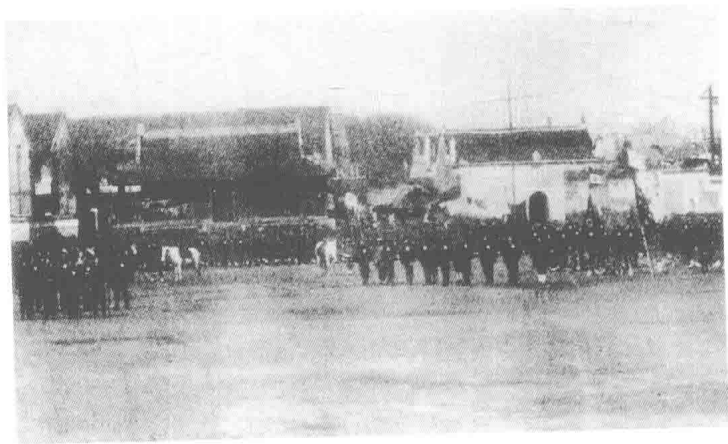
賈太傅祠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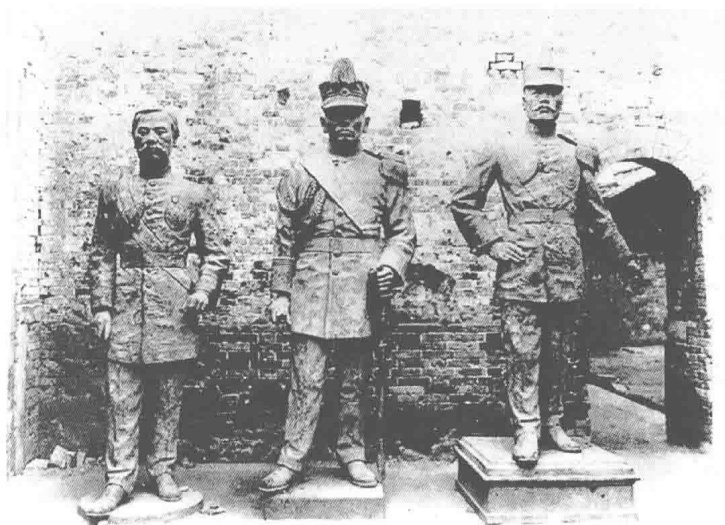
长沙体育馆路协操坪操练的起义新军



长沙城头辛亥起义军占领炮台后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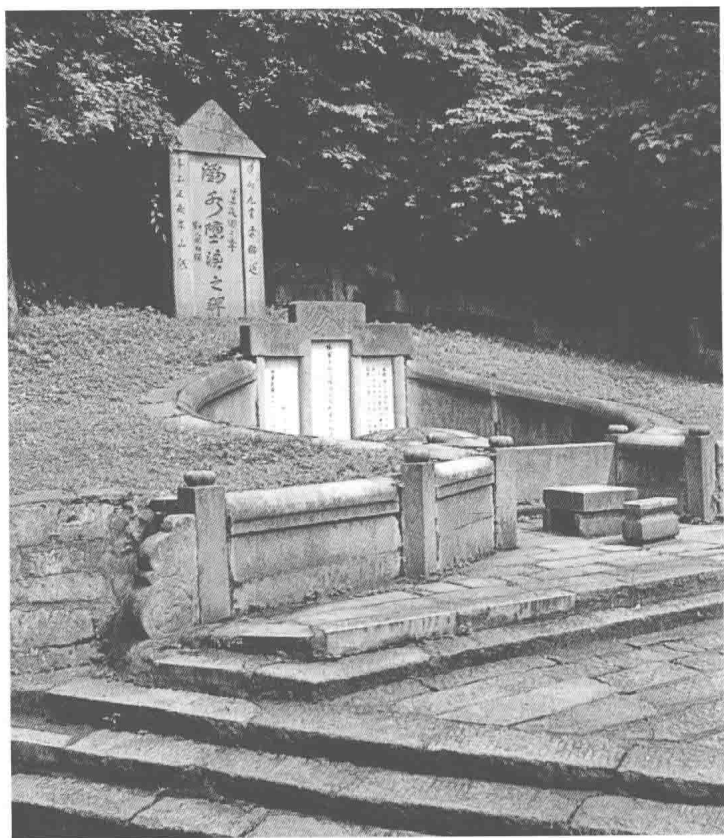
援鄂湘军在长沙协操坪誓师出发



焦达峰、陈作新、杨任(右起)三烈士铜像



焦达峰故居



焦达峰墓

湘籍辛亥风云人物传记丛书 总序

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首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也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大解放，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因此，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湖南则因其特殊的历史机缘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地域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如国内率先发动的长沙起义，引领长江流域革命的鄂宁起义，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以绅商为主体带头发动的湖南保路运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沙抢米风潮，湖南首先响应武昌首义以及派遣湘军援鄂、策动各省光复等等，都是整个辛亥革命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

辛亥革命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仅改造着社会，也改造着人们自身，诚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①。辛亥革命不仅铸就了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而且造就了一个庞大的领袖集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领袖集团

① 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3月8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1页。

中，湖南人以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贡献之大、影响之深，格外引人瞩目。其中有与孙中山齐名，领导过 10 多次武装起义的“武圣”、陆军总长黄兴；有以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和奋起讨伐袁世凯、声威播于海内外的护国将军蔡锷；有率先加入湖北新军，担任过湖北著名革命团体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前被推举为临时总司令的开国元勋蒋翊武；有精通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被人们赞誉为“第一流政治家”“为宪法流血第一人”的宋教仁；有代理孙中山、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抵制倒孙风潮，粉碎暗杀孙中山阴谋，为辛亥革命一家牺牲三位亲人的“痛苦的革命家”刘揆一；有受东京同盟会总部派遣领导过萍浏醴起义，被清吏杀害而成为“同盟会员中为中国革命流血第一人”“留日学界为中国革命流血第一人”的青年革命家刘道一；有一生四次加入革命团体、六次担任总司令，开辟整个华东战场，在沪宁光复过程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李燮和；有著名通俗宣传家、被时人称之为“革命党之大文豪”，著名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的作者陈天华；有在日本参与创办《游学译编》和湖南编辑社，着力介绍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帝国主义本质有着深刻认识的《新湖南》作者、蹈海志士杨毓麟；有大胆改革《苏报》、大造革命舆论、第一个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梦》节译出来，将孙中山首先介绍给国人的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士钊；有以联络会党为职志，在汉口、汉阳相继失守的关键时刻临危受命，出任过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人称“托塔天王”的谭人凤；有担任过同盟会湖南分会长，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备受酷刑而宁死不屈的革命活动家禹之谟；有担任过同盟会调查部长，嗣后又参与组织著名革命团体共进会，并率先响应武昌首义，被推举为湖南首任都督的焦达峰；有秘密策划武昌首义，事泄被捕、英勇就义的武昌首义著名三烈士之一的刘复基；有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受阻、投黄浦江以死抗争的姚宏业；有主编过《洞庭波》杂志和《帝国日报》，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事泄被捕的“牢狱诗人”宁

调元；有回国响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在江苏扬州谋刺两江总督端方、慷慨捐躯的杨卓林；有毁家纾难、离乡背井，长期以山西为主要活动区域，辗转于长江流域各省，联络会党密谋起义，失败后被捕而殒命的郑子瑜；有在广州新军中秘密散发“保亚票”，联络清巡防营中会党，策动反清武装起义被捕牺牲的谭馥、葛谦；有在新疆领导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将民主革命烈火燃遍天山南北，誓与迪化共存亡，被捕牺牲的刘先俊；有在甘肃领导秦州（今天水）起义、宣布秦州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担任都督的黄钺；有在贵州率先成立自治学社、担任贵州枢密院院长的张百麟。几乎可以说，在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人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留下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足迹，在辛亥革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曾建立过不朽的历史功勋！

孙中山于1912年3月6日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给予陈天华、杨毓麟、杨卓林、郑子瑜等湖南死难烈士以高度的评价，并批准建立烈士祠。他在给陆军部下达的批文中明确批示：“按民国缔造之功，匪一手足之烈，睹兹灿烂之国徽，尽系淋漓之血迹。以上诸烈士，或谋未遂而身赴西市，或难未发而殒命囹圄，或愤铁弹之一击，或举义旗于万夫，或声嘶去国之吟，或身继蹈海之烈”；“此次义师一呼，万方响应，实由民族学说灌输人心，已匪朝夕，故铜山崩而洛钟应，光复大业，期月告成”。^① 这段赞词无异于给所有湘籍志士的反清革命活动勾勒出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历史画卷！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湘籍辛亥风云人物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出版著作、译作，创办报章杂志，广泛开展革命的舆论宣传。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是杨毓麟、陈天华等人率先向国人敲响了警世

^① 孙中山：《令陆军部准建杨、郑二烈士专祠并附祀吴、熊、杨、陈四烈士文》（1912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183页。

钟！他们撰写、出版了一大批唤醒国人的著作，其中较早的代表作是杨毓麟的《新湖南》。该书于1902年冬在日本东京刊行，早于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著作。《新湖南》虽以省区命名，但其出发点并非仅仅论述湖南省范围内的区域自治，而是基于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世界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以其广阔的政治视野探索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杨毓麟将湖南人的历史责任放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体中进行考察，同时又将振兴中华的事业放在新世纪的世界全局中来认识，他的著作因此具有超越同时代革命党人的思想深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毓麟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最深刻的，诚如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曾经指出的，“作者对帝国主义这个怪物的认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先进的中国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理解”^①。《新湖南》以强烈的理论色彩见长，容易在“中等社会”，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此书出版后，“风行于世”，大量传播内地，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新潮读物之一。

如果说杨毓麟的《新湖南》是用文言文写成，专从学理上阐述反帝反封建斗争，容易在“中等社会”中广为流传的话；那么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则是用白话写成，更容易在“下等社会”，即广大下层劳动群众中传播开来。1906年，龙华会会员、浙江金华人曹阿狗到处演唱《猛回头》，被金华知府杀害。为此，金华知府出一告示，诬称《猛回头》为“逆书”，“阅者杀无赦，以阿狗为例”；可是，“索观此逆书之人益多，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②。据史料记载，士兵读之，“奉为至宝”；学生读之，“如同着迷”，“时以偷看《猛回头》为乐”。当时革命派在新军中的代表，甚至以此为政治教材，士兵退伍，“散至民间，则

① 章开沅：《湖南人与辛亥革命》，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②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20年，第130页。

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①。《猛回头》《警世钟》两书再版10余次，仍然供不应求。陈天华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使他赢得了“革命党之大文豪”的赞誉！

除上述著作之外，还不能不提到一批颇具影响的译作，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家赵必振的译作。他于1902年在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所著《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和《广长舌》；翌年，他又翻译出版了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人权发达史》《世界十二女杰》《东亚将来大势论》《阿拉伯史》《土耳其史》《巴比伦史》《希腊史》《罗马史》等10余部著作；他是我国早期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著名翻译家，尽管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此外，由黄兴、杨毓麟于1902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游学译编》是“全以译述为主”的刊物。是年底，又由黄兴、蔡锷等人创办了“湖南编译社”，大量译介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这一大批湘籍志士的译著，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则无论从广度或深度方面较诸启蒙大师严复都有所前进！

报刊是舆论之母，是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湘籍志士始终把创办报章杂志作为推动民主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前后，即从1901年到1917年，由湘籍志士创办或主编的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章杂志总数多达40余种。他们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包括时评、社论、新闻等等，大都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上述著作、译作和文章犹如黑血、金鼓、警钟、木铎，敲响了清王朝灭亡的丧钟！

第二，聚集人才，创建革命团体，深入进行组织发动。

1904年2月以黄兴为首成立的华兴会，是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人数多达数百人。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华兴会除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上海书店，1982年，第130页。

个别成员外，几乎全部加入了同盟会。据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统计，1905年至1907年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湘籍志士157人，仅次于广东。^①同盟会东京本部所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中，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实居协理之职。其后，代理庶务干事、主持本部工作的还有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刘揆一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宋教仁还担任过司法部检事长。胡瑛、覃振、陈家鼎、范治焕等任评议部评议员。同盟会章程八名起草人员中即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人，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07年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焦达峰被推举为交通部长。对于组织共进会，刘揆一“极表赞成”。该会创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加强会党的联络工作，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事业。由于焦达峰、刘揆一及川人张百祥、吴玉章等同盟会会员的推动，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等会党组织在日本的首领“终于在1907年的下半年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②。

为进一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事业，中部同盟会应运而生。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选举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为总务干事。公推谭为总务议长，负责召集会议、保管文书及印信等事，会后发布了谭起草的成立《宣言》；宋教仁被推举任文事，他亲手制定了《中部同盟会总会章程》《总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等等。谭、宋二人实居于核心地位。

上述两个革命团体尽管在成立过程中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它对统一全国各地会党、促成同盟会将战略重点由东南沿海转移到长江流域、推动中部地区的革命事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其积极作用还是主要的。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5页。

②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49页。

1908年12月在广州成立的保亚会，是谭馥、葛谦等湘籍志士为策动广州巡防营起义而设立的革命团体。保亚会采用唐才常领导庚子自立军起事散发“富有票”的方法，在广州巡防营士兵中散发“保亚票”，嗣因鄂人严国丰不慎失落“保亚票”，而使这次策动清巡防营起义的计划泄露而归于流产。葛谦、严国丰当即被捕就义，谭馥于翌年被捕牺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北革命团体的演变中，鄂籍志士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湘籍志士的参与更是湖北革命团体屡仆屡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甚至还担任了湖北革命团体的主要领导者。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1906年成立的日知会，辜天佑为干事，胡瑛为主要活动分子；1908年成立的军队同盟会，湘籍志士杨王鹏、钟畸、章裕昆等都是该组织的骨干成员；同年底成立的群治学社，“暂设庶务一人，主持会务”，众推钟畸为庶务；^①1910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杨王鹏任社长；钟、杨均为著名的湘籍英烈。1911年，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蒋翊武任社长，武昌首义前夕，文学社已发展会员多达3000人，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革命团体。正是文学社与湖北另一个革命团体共进会联合，共同领导了武昌首义。

第三，拥戴孙中山，维护孙中山，勇敢地捍卫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当清政府横加诬陷、悬重赏捉拿孙中山的时候，当保皇党人肆意诋毁、恶毒攻击孙中山的时候，当多数革命党人由于孙中山形象被扭曲而对其产生误解、不敢与其接近的时候，是毕永年、秦力山等一批湘籍志士主动与孙中山站在一起，风雨同舟，带头与孙中山交友，从而较早地沟通了孙中山与留日学生之间的感情。孙中山与湖南知识界最早取得联系的代表人物是长沙拔贡毕永年。毕于1899年东渡日本，率先加入孙中山最早创立的革命团体兴中会，

^① 张难先：《群治学社之始末》，严昌洪等编《张难先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旋奉孙中山之命，回国调查国内会党势力，从事联络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工作。同年冬，毕永年邀约哥老会各山堂正龙头齐集香港，与陈少白联络的三合会合作，并在兴中会本部举行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合并大会，另拟会名为“兴汉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孙中山，秦力山曾有过为孙中山立传的想法，后因担心别人说他“好标榜，复罢之”。但这一意愿终于由另一个湖南人章士钊在1903年实现了，章利用他在沪上主《苏报》笔政的余暇，节译了日本志士宫崎滔天撰写的《三十三年之梦》，以《孙逸仙》为书名出版。章士钊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率先喊出：孙逸仙为“近今谈中国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有孙逸仙，中国始可为！”这种认识与秦力山极相类似，因而秦热情为该书作序，尊崇孙逸仙为“天锡之勇者”^①。此书一出，“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这对人们全面了解、重新认识孙中山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1903年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出版为契机，初步确立了孙中山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地位。

此后，在陶成章、章太炎、张继等人连续两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关键时刻，是黄兴、刘揆一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1907年3月，在第一次倒孙风潮中，陶成章等人要求当时主持本部工作的刘揆一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便开除孙中山，另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为此，张继竟然同刘揆一在《民报》社编辑部互相揪打起来。刘揆一坚持认为，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②。就在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之时，日后成为叛徒的刘光汉伙同日本人

① 黄中黄：《孙逸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1页。

② 刘揆一：《黄兴传记》，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